

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

严志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洪梅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目前带有“𦉳”符号的器物共有10件，均为印章。“𦉳”表现的是青铜钟的形象。“𦉳”（钟形符号）似为蜀人的特征性符号，其与壘形符号均为蜀人文化中具有标识社会等级的符号。出土带有“𦉳”符号的器物的蜀人墓葬的墓主均为社会上层。

关键词：巴蜀符号；巴蜀图语；巴蜀印章；钟形符号

70多年来，学界对巴蜀符号进行了较多研究，在资料整理、分期断代、符号特点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与分歧还很多，如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学界还存在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要解决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应先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等，才能考虑进一步的解读与研究。

据初步统计，已经刊布的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约750件，150余类巴蜀符号。这些符号的出现频率、出现地域常有不同。其中，“𦉳”符号虽然不多，但内含丰富，又常与其他符号共出。因此，本文拟对巴蜀符号中的“𦉳”符号稍作探讨，希望对相关的研究能有所助益。

一 带有“𦉳”的器物

就目前材料所见，带有“𦉳”的器物共有10件，均为印章。

1. 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33 出土铜印 (M33 : 4)

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33。边长 3.6、印台厚 0.45、残高 0.65 厘米。印背有四个符号“十王く𦉳”，并有斜十字格加以间隔。印面分二栏，上栏有勾云纹，下栏为“𦉳𦉳”，两

符号间以反“S”形符号加以间隔（图一）。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船棺墓，墓口长 6.4、宽 1.05 米。出土器物 16 件。发掘报告将该墓年代定为战国中期晚段。^[1]我们认为该墓当为战国中期早段。



图一 什邡市城关战国墓铜印 (M33 : 4) 拓片
1. 印背 2. 印面

2. 新都县马家公社战国木椁墓出土铜印

出土于四川新都县马家公社战国木椁墓。印宽 3.5、高 1.4 厘米（一说边长 3.4、高 1.1 厘米^[2]）。此印为巴蜀文化诸印中装饰最为华丽者。印背中心置桥形纽，纽两侧对称布置一浅浮雕兽面纹，印面符号为“𦉳𦉳𦉳𦉳”（图二：1）。此墓是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墓道长 8.82、墓坑长 10.45、宽 9.2 米。随葬品丰富，其中鼎、壶、壘、三足盘、豆形器、釜、釜、戈、钺、斧等都是 5 件或 5 倍之数。发掘简报认为该

墓的年代为战国早、中之际，也可能是秦灭巴蜀以前。^[3]该墓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容器，其中鼎与望山 M1 所出鼎 (M1 : T37)^[4]类似，甗、盨缶与随州擂鼓墩一号墓所出者 (C . 165、C . 189)^[5]相似，另一甗与荆门包山 M2 所出甗 (M2 : 77)^[6]相似，从算眼的形制看没有包山 M2 的规整，所以时代应比其稍早。随州擂鼓墩一号墓为战国早期中叶，望山 M1 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早，荆门包山 M2 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综上，定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早段。关于该墓墓主，发掘简报认为可能是古蜀国的蜀王，可从。

3. 蒲江县东北乡 M2 出土铜印 (M2 : 25)

出土于四川蒲江县东北乡 M2。边长 3.1、高 0.85 厘米。此印和印套组合，印台富丽，上饰饕餮纹。印面符号为“𠄎𠄎 | ○𠄎” (图二 : 2)。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残长 8.02、宽 2.86 米，并列独木棺两具。发掘简报定其年代为战国中期。^[7]由于该墓所出青铜器较少，根据其所出的陶釜、陶豆、陶釜等形制特点，笔者定其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

4. 荣经县北郊同心村 M21-B 出土铜印 (M21-B : 23)

出土于四川荣经县北郊同心村 M21-B。直径 2.7、通高 0.6 厘米。印面符号为“𠄎𠄎𠄎𠄎”，另饰勾云纹 (图二 : 3)。该墓为船棺葬，墓口长 5、宽 1 米。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兵器组合和矛，容器组合为釜和釜，工具有斧与削，陶器组合为豆、圆底罐和釜，另有铜盆等。与该墓上下重叠的 M21-A 出土陶器 30 件、铜器 42 件、铁器 1 件。发掘简报定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8]M21-A 墓铜缶 (M21-A : 2) 与望山 M2 所出铜缶 (M2 : T90)^[9]相似，所出匜 (M21-A : 56) 与襄樊贾庄 M1^[10]和江陵张家山 M201^[11]所出类似。望山 M2 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襄樊贾庄 M1 年代为战国中期中叶，而张家山 M201 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结合该墓所出铜器及陶器均丰富，未见秦文化因素，故该墓的年代应当在秦灭巴蜀之前，为战国中期晚段。M21-B 的时代也应为战国中期晚段。

5. 荣经县北郊同心村 M22 出土铜印 (M22 : 13)

出土于四川荣经县北郊同心村 M22。直径 1.8、通高 0.8 厘米。印面符号为“𠄎𠄎” (图二 : 4)。此墓为船棺葬，墓口长 2.5、宽 0.8 米。铜器有矛、剑、斤、釜、釜。^[12]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看，为较典型的巴蜀风格，其中斧为凸圆刃尖角，具有战国中期晚段的形制特点，故笔者定其为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6. 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0 铜印 (M10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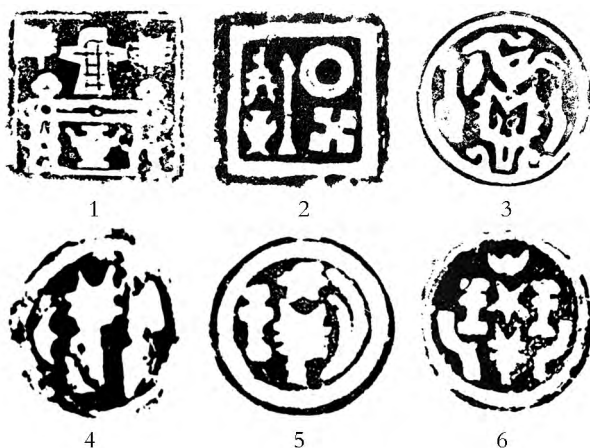
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0。直径 2.5、印台高 0.2、通高 0.7 厘米。印面符号为“王𠄎” (图二 : 5)。该墓为长方形土坑墓，男女合葬，仰身屈肢。兵器组合为钺、戈、剑、矛，铜容器有釜、甗。^[13]其中钺圆角圆刃，矛中脊凸出，具有战国中期晚段的形制特点，笔者定其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7. 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 M1 铜印 (M1 : 36)

出土于四川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 M1。高 0.5、直径 2.6 厘米。印面符号为“王★王𠄎” (图二 : 6)。此墓发表器物较少，随葬品中有罐形器、釜形器，部分陶器饰粗绳纹。^[14]笔者以为该墓的时代在秦灭巴蜀之前，定为战国中期偏晚。

8. 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 M5 出土骨印 (M5 : 22)

出土于四川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 M5。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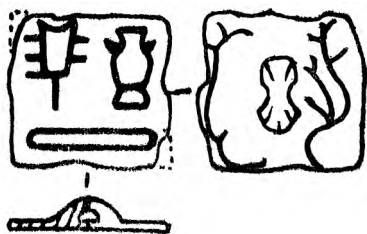


图二 带有“𠄎”符号的铜印拓片

1.新都县马家公社战国木椁墓铜印 2.蒲江县东北乡墓葬铜印 (M2 : 25) 3.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铜印 (M21-B : 23) 4.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铜印 (M22 : 13) 5.什邡市城关战国墓铜印 (M10 : 7) 6.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墓葬铜印 (M1 : 36)



长 2.3、高 0.4 厘米。印面为“𦉳”（图三）。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尺寸不详。出土器物 24 件。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为战国中晚期，^[15]可从，但具体来说似可定为战国晚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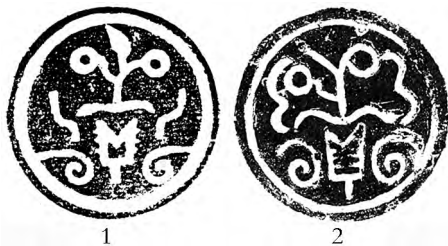
图三 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 M5 出土骨印(M5: 22)

9. 《巴蜀铜印》著录铜印

出土地不详。高 2.7、宽 4.1 厘米。印面符号为“𦉳”。“𦉳”两侧有对称的勾云纹（图四：1）。^[16]

10. 《巴蜀铜印》著录铜印

出土地不详。高 2.7、宽 4.6 厘米。印面符号为“𦉳”。“𦉳”两侧有对称的勾云纹（图四：2）。^[17]根据上一铜印印面符号可知，巴蜀符号“𦉳”与“𦉳”似应为同一性质的符号，即二者是一文之异。



图四 《巴蜀铜印》著录铜印

二 “𦉳”符号的原形及意义

关于“𦉳”之原形，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说是“铎”。李学勤、沈仲常、孙华均以为是“铎”，但无具体论说。^[18]

二说是“牙璋”。吴怡认为：“巴蜀印章上面的‘铎’文之说，只是一种猜想，并无实物证明。而‘铎’的形状当为两侧无齿，其器在巴蜀墓葬几乎不见出土”。并认为“牙璋的前部称之为‘射’，射本部两侧有齿饰，有的二齿、三齿，有的六齿、七齿不等。……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方印章上面的‘铎’在本部两侧有三

齿，形状与牙璋十分相似”，因而认为“𦉳”之原形为牙璋。^[19]此说得到了冯广宏的认同，^[20]李学勤又认为是“玉璋”。^[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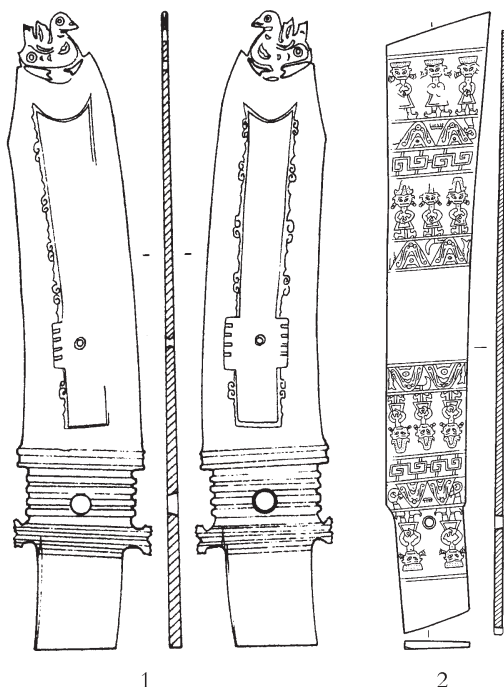
三说是“钟”。高大伦认为是“钟”。^[22]

虽然尚不能确定以上观点何为确切答案，但无论是“铎”、“钟”还是“牙璋”，都是巴蜀文化重要的礼仪用品。只是巴蜀文化“牙璋”的使用仅见于晚商时期，目前只集中出土于三星堆祭祀坑与金沙遗址，周代到战国时期则鲜有出土，而铎或钟则为这个时期巴蜀文化中较为常见的器物。而且牙璋突出的阑齿都在本（邸）部，与“𦉳”两侧有齿不类；且“𦉳”下部还有一突起，这一特征则绝不见于任何牙璋上。另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上即有牙璋的图像。三星堆祭祀坑一号坑的 K1: 235 - 5 是一件非歧尖而雕有小鸟的牙璋，牙璋两面各刻有对称的牙璋形象，射本部的齿饰外侧缘平直，齿间基本连在一起（图五：1）。^[23]三星堆祭祀坑二号坑的 K2: 201 - 4 是一件非歧尖的斜刃牙璋，牙璋无齿饰，射部与本部饰二段基本对称的图像，表现时人用象牙与牙璋对山川进行祭祀的场景，其中山侧所置牙璋形象为歧尖并表现出长尖与短尖的区别，齿饰亦是并列连在一起的（图五：2）。^[24]从这两个牙璋的形象与“𦉳”形符号对比来看，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笔者倾向于高大伦的意见，认为“𦉳”实为“钟”的象形符号。“𦉳”的两侧的齿是钟枚，三排钟枚是青铜纽钟或甬钟的常制。“𦉳”底部的突起是钟纽，四川荣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铜印（M21-B: 23）上的“𦉳”符号作“𦉳”形，明显表现出其为纽钟所特有的钟纽，是为“𦉳”为钟而非牙璋的显例。只是这个符号出现时多以歧尖朝上放置，似乎与钟在使用时铎部朝下的方式不同，这也是一些学者将“𦉳”视为玉璋的一个理由。但四川蒲江县东北乡墓葬铜印（M2: 25）中“𦉳”的歧尖则是朝下的。

三 “𦉳”符号的身份性意义

分析“𦉳”符号的所代表的意义，应结合与其组合出现的符号来综合考虑。与“𦉳”常组合出现的有“𦉳”符号，上举 10 枚铜、骨印中即



1
图五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璋
1.K1 : 235-5 2.K2 : 201-4

有4枚的“𦉳”与“𦉳”共出。“𦉳”与“𦉳”一样，也是巴蜀文化中某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的象形，从器型上看应为青铜罍。茂县牟托村石棺一号墓的石棺顶部放置一件青铜罍（图六：1），而在顶部左侧放置了一件青铜甬钟（图六：2）。^[25]这种精心又独特的摆放方式，正是巴蜀文化符号中罍（“𦉳”）与钟（“𦉳”）这一组合的现实展示。



1
图六 茂县牟托村石棺一号墓出土铜器
1.铜罍 2.铜甬钟

“𦉳”是巴蜀符号中对青铜罍的象形摹写，罍形符号作为罍在巴蜀人社会生活中的印射，青铜罍在四川的巴蜀文化中确实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早在商代晚期，青铜罍就被社会上层特别的加以使用了，并逐渐形成了以五个为基准的

列罍制度。高大伦认为罍与钟“是蜀人的重器，是蜀人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象征，是蜀文化核心价值的最重要体现，是蜀人上层身份的重要物证”。^[26]这些列罍的出现与使用，明确说明巴蜀文化对罍的重视，较其他铜器有更重要的意义，并以此形成了独特的使用礼规。“𦉳”形符号主要出现在川西的蜀地，在东部峡江一带的巴人地区也偶有使用。出现“𦉳”符号的墓葬等级一般较高。^[27]

“𦉳”这一符号见有出土地点的有荣经（4件）、什邡（2件）、新都（1件）、蒲江（1件），在川西蜀人聚居区比较集中。而峡江巴人区目前则还不见。“𦉳”与“𦉳”的分布近似又更有地区性与族群性，有可能是蜀人特有的符号。

“𦉳”与“𦉳”的组合，仅出现于印章中，也说明在当时蜀人的社会意识里，印章是一类重要的标示物，鉴于出有“𦉳”的墓葬级别比较高，拥有“𦉳”与“𦉳”印章者，当是蜀人社会中的高地位者。而其中的方形印的持有者的权位似乎要比持有圆形印者为高。上举10枚印中，方形印的尺寸都相对较大，其中考古出土方形印边长都在3厘米以上，而圆形印直径都在3厘米以下。而且方形印的装饰都较为精美华丽，如新都马家木椁墓方印上饰对称兽面纹。蒲江县东北乡M2铜印（M2：25）印和印套组合出土，印台富丽，上亦饰兽面纹。而“𦉳”与“𦉳”也仅共出在方形印中。“𦉳”应该是蜀人文化中具有社会等级身份含义的符号。

考古出土的4枚方形印中，3枚铜印所出墓葬年代均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正是秦灭蜀前的最后阶段。3座墓分别是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33、蒲江县东北乡墓葬M2、新都县马家乡木椁墓。其中新都马家木椁墓印章中印面两个“𦉳”的组合，是巴蜀文化器物中仅见的例子，表现出其尊贵身份的唯一性。故学界多认定其身份为古蜀国国王。而蒲江M2与什邡M33二墓则分别位于新都蜀王墓的一南一北，其墓主应该是当时分处新都（成都）南、北的诸侯一级的蜀国高级贵族。这与笔者对“𦉳”形符号分析所得此阶段古蜀国政治文化态势是一致的。^[28]

战国晚期早段的荣经县南罗坝村M5方形骨



印 (M5 : 22), 则需单独分析。若从形制上看, 方形印自然是一种高规格的印章形制, 但却不用铜质而用更为廉价的骨质, 说明墓主的经济力量已经严重衰落, 而出土随葬品中也少有精美者, 也是一个补证。另外, 印面符号只有“王”与“𠄎”, 较另外 3 枚方形印少了诸多其他符号。像荣经县南罗坝村 M5 这样的骨印, 应是战国晚期偏早阶段秦举巴蜀以后, 古蜀遗民在向西南山地退避这样一种历史情境的产物。结合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与荣经县南罗坝村方形印印文中“王”与“𠄎”的情况来看, 王与钟, 确实应为战国时期蜀文化礼制中的核心元素。这一认识对处于四川盆地一些文化区边缘与交界区发现的文化成分复杂的遗存的族属的辨识会有积极的作用。

“𠄎”与“王”作为固定组合出现外, 也见与其他符号组合出现。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 M5 出土骨印 (M5 : 22) 的符号内容为“𠄎王〇”。关于其中的“〇”形, 目前仅此一见。这一符号与“𠄎”、“王”同出, 并被置于钟形与壘形之下, 很可能就是承器之用的“禁”或几案的象形。骨印符号表现的是陈列钟与壘于禁上进行祭祀的形象, 而拥有钟、壘这二种蜀文化礼制核心器物并拥有祭祀权者, 无疑是蜀文化社会中的上层。

从此角度还可以对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铜方印的符号进行一点推论。该铜方印中处于两个钟形符号之下, 壘形符号之上的“𠄎”, 很可能是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 M5 骨印 (M5 : 22) “〇”的原形, 也就是“禁”或几案的细致的摹绘。因此, 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铜方印与荣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 M5 骨印的符号主题是一致的。

巴蜀符号中也有作“𠄎”者, 见于珍秦斋所藏的战国时期的铜印。该印长 1.2、宽 0.8、高 2.35 厘米, 符号中有“𠄎王” (图七)。^[29]若这枚铜印确为战国时期之物, 则其中符号“𠄎王”的组合形式与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铜印中符号“𠄎王”是相同的组合形式, “𠄎”很可能是“𠄎”的简化形式之一, 即也是几、案的象形。

在圆形印中, “王”符号较为频出, 如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 M1 和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0、



图七 珍秦斋藏铜印

M33 出土铜印。但统观巴蜀文化器物, “王”符号则是很常见的符号, 约有 100 件, 器类有戈、矛、剑、印、刀、壘、斤、带钩、盘等; 文化与族属上也分跨巴、蜀。其具体社会学含义还不清楚。但荣经县烈太乡自强村墓 M1 : 36 与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0 : 7 这 2 枚圆形印都有“王𠄎”的组合, 两墓墓主的身份在蜀文化社会应相近, 且较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33、蒲江县东北乡 M2 的墓主的身份稍低。

根据以上的分析以及墓葬大小等情况, 可以初步将出有“𠄎”符号器物的蜀文化墓葬的墓主人分为三层级: 第一级, 新都马家木椁墓墓主; 第二级, 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33 与蒲江县东北乡 M2 墓主 (或可包括荣经县南罗坝村 M5 墓主); 第三级, 荣经县自强村墓 M1 与什邡市城关战国墓 M10 墓主, 以及荣经县同心村 M21、M22 墓主。这三级在蜀人的社会层级中均为社会上层。

四 余论

《巴蜀铜印》著录的 2 枚铜印印面符号基本相同, 只是“𠄎”有差异, 一是三排枚在外侧, 一是则在内侧。将后者归入“𠄎”中是基于对这 2 枚铜印印文的综合考虑。印中与“𠄎”组合的“王”, 二印稍异, 但应该还是同一符号。这一符号也见于考古出土品中, 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 M1 出土一件铜兽头饰 (M1 : 36), 可能是钟架构件虞上的饰件, 上有巴蜀符号“王”。该墓长约 6、宽 4.2 米。出土遗物丰富, 其中有 14 件编钟。^[30]另外, 四川宝兴县陇东乡汉塔山采集的一件战国铜盆, 口径 42、底径 22、高 9.5 厘米。盆沿上有巴蜀符号“王”。^[31]“王”、“𠄎”、“𠄎”、

“𠄎”很可能是同一符号的异体。但这几件铜器所出位置分散，器类较杂，我们对其社会意义尚不能作过多推论。小田溪 M1 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偏晚，或即这 2 件传世圆印的大致年代。

注释：

- [1]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 52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b.四川省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什邡馆藏文物集粹》，第 12 页，四川美术出版社，1997 年。
- [2] a.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 43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b.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图一九六、一九七，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c.四川博物院编：《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第 55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 [3]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 年第 6 期。
-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第 45 页，文物出版社，1996 年。
- [5] 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第 205、239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6]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墓》，第 103 页，文物出版社，1991 年。
- [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 年第 5 期。
- [8]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 261、275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b.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 13 页。
-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第 132 页。
- [10] 王先福等：《湖北襄樊市贾庄发现东周墓》，《考古》2005 年第 1 期。
- [11]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 201 号楚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4 年第 2 期。
-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 261、262、275 页。
- [13]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 247 页；b.四川省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什邡馆藏文物集粹》，第 13 页。
- [14] a.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 15 页；b.李

晓鸥、刘继铭：《四川荣经县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 年第 7 期。

- [15] 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 年第 3 期。
- [16]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 42 页。
- [17] 高文、高成刚编著：《巴蜀铜印》，第 41 页。
- [18] a.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 期；b.沈仲常：《新都战国墓出土铜印图像探原》，《江汉考古》1982 年第 2 期；c.孙华：《巴蜀文物杂识》，《文物》1989 年第 5 期。
- [19] 吴怡：《浅析铜罍在巴蜀青铜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特点》，《四川文物》2002 年第 5 期。
- [20] 冯广宏：《巴蜀王玺印文字试解》，《文史杂志》2013 年第 5 期。
- [21] 李学勤：《蜀国的璋、罍》，《比较考古学随笔》，第 54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22] 高大伦：《蜀文化礼器初探》，卢丁、[日] 工藤元男主编：《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调查报告之一》，第 293~302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2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 81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 [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 361 页。
- [25] 茂县羌族博物馆等：《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 18、19 页，文物出版社，2012 年。
- [26] 高大伦：《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小议》，《四川文物》2011 年第 6 期。
- [27] 严志斌、洪梅：《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罍形符号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待刊。
- [28] 同 [28]。
- [29] 萧春源：《珍秦斋藏印（战国篇）》，第 153 号，（澳门）澳门基金会，2001 年。
- [30]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 年第 5 期。
- [31]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 年第 3 期。